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发展全史

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

第五章 去与留——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

第一节 四分五裂的“智囊团”

蒋介石历来标榜自己重视知识分子，在他的周围，确实聚集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了他的智囊团。这既是他引以自豪之举，也令许多知识分子怀有“知恩图报”之念。从 1948 年下半年到 1949 年，蒋介石的智囊团却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智囊人物一个个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他们追随的“领袖”。这并不是几个人的感情冲动所使，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是他们对社会大势分析预测后作出的人生选择。属于蒋介石“智囊团”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归宿大致可分为 4 种类型：王宠惠、梅贻琦、王世杰型；陈布雷、戴季陶型；胡适型；翁文灏型。第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继续从事思想文化及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直至去世。1949 年以后，台湾地区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得益于他们的贡献不少。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明确的——与旧政权共存亡。然而，1949 年国民党政权的变数太大，大多“智囊团”内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对事业、对前途、对职业良心乃至对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期盼，从而做出不同的人生决断。第一种类型的心态比较单一，后三种类型相对复杂，以下做重点介绍和分析。

陈布雷感激“殉道”，戴季陶悲观弃世

陈布雷对国民党一直信心十足。他置身政治漩涡，却怀有文士心境，留恋书生生活，所以，抗战时期，在参赞蒋介石政府敢事期间，尽量多地与各方知识分子沟通，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动员知识分子参与党国事务，改善政府声誉，提高政治效率，在参政之余，有时也能兼重学术。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独享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实现独裁日益迫切，陈布雷的地位逐渐显赫起来。他曾经说过：“他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然而，现在他已迈到蒋介石政府的前台。他不仅是蒋介石的贴身幕僚的统领，还逐渐成为蒋介石政府新闻宣传的决策者和主管者，调动各种舆论工具，帮助蒋介石策划“戡乱”动员，压制各种破坏“戡乱”的言论，被誉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1948 年 3 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陈布雷的政治生涯也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

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直接参与国民党的军政大事。

陈布雷生性淡泊，平时不喜钻营结党，排斥异己，对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及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唯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不停地为蒋介石撰写文稿。他的生命已逐渐融入了蒋介石的政治躯体之中，“对于党国，只作无条件之贡献，而毫无所求，对于总裁之一切，只有‘无微不至’四字足以当之，渠之思想与总裁不可分离（实已到‘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之境地），甚至渠之生活亦无形中与总裁发生联系，比如总裁未就寝前，渠不肯就寝，总裁已起身时渠必先起，午后必至总裁休息时，渠方敢轻松稍事休息，无论到何处必告家中以地址，盖恐总裁随时召见或通电话也。对于党国大事，虽因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如布雷先生者，庶足以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有人说他在蒋介石政府中，可以说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可是，仅仅过了7个月，即1948年11月13日，这个在西方看来不吉利的日子，陈布雷就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探讨陈布雷的自杀前的心境，可以为我们了解蒋介石御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提供一条捷径。

关于他的自杀，当时就在社会上传说纷纭。但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陈布雷不希望在他死后，外界出现对蒋介石不利的各种传言，临死前，他连如何公开发表他逝世的消息都作好安排。他在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遗书中，拜托两位极力为自己的自杀行为辩护，依他的意思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在陈布雷给蒋介石、夫人王允默、自己儿女、三个弟弟、同僚中政会副秘书长洪兰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官陶永标等人的遗书中，他一再陈述自己离世的缘由，主要是因为身体衰弱，精力不济，无法承担为党国为蒋介石继续“戡乱剿共”、力挽危局的重任，与其在其位不能谋其职，不如以死结束无价值之生命，一味自责。如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五负教诲。但自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人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命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承自己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在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信中说：“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嫫媿’，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生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愤愤无地。昔者公闻中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之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污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二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怨自全之理……”

从字面上看，信中通篇在自怨自责，口口声声说对不起“主公”，因为心里有愧，

才离世而去。然而，透过表层，我们不难看到陈布雷的内心世界。如他所说的“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值此党国最艰危时期”、“书生无用，负国负公”、“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所闻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污蔑者”、“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宣传”，都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对民众舆论中“毒素”的无奈，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和劝谏以及对为之奋斗一生事业的失望。

然而，在这之前的一年，陈布雷对蒋介石政府还充满信心。1947 年，《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为《文汇报》被查封的事到首都南京“活动活动”，官方提出报纸复刊，必须答应官方提出的两项条件。被徐铸成严词拒绝，他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再说《文汇报》由我负言论责任，所登文章，均经我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我一人负。”临回上海前，他去见了陈布雷一面，当陈布雷确信徐铸成拒绝有条件复刊之意已决，且时龄已届 41 岁后，带着惋惜、训导、调侃而又信心十足的口气对徐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二十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此时的陈布雷，已看到国民党的腐败，然而，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在两三年内，大厦根基就已动摇，而且倾覆速度如此之快。促使陈布雷“以身殉国”的事情在 1948 年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地发生。1948 年春天以来，令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党国面临艰危的事有哪些呢？现以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2 月 26 日，解放军收复营口；
- 3 月 3 日，解放军在陕北取得宜川大捷，14 日解放军攻克洛阳，15 日解放军结束东北的军事攻势，孤立长春、沈阳；
- 4 月 22 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国统区爆发反迫害、反饥饿运动；
- 5 月，解放军取得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胜利，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被粉碎；
- 6 月 22 日，解放军占领开封；
- 7 月 16 日，解放军收复襄阳，21 日解放军结束晋东战役；
- 8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
- 9 月 24 日，济南被解放军攻克；
- 10 月 15 日，解放军攻克锦州，19 日解放长春；
- 11 月 1 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元券崩溃，物价飞腾，2 日，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虽经蒋介石三次飞临前线督战，但国民党军队仍以被歼 47 万而告北；6 日淮海战役开始；蒋管区失败主义盛行；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已在各阶层中普遍流行；舆论界不能整齐划一，有的为蒋介石的“戡乱”大唱赞歌，不利于蒋介石的种种言论也大有市场……

以上有些事就发生在陈布雷的眼皮底下，如南京的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到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

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他的办公室就在山西路对接的湖南路上，呐喊声时时入耳，他“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事，急需作为智囊团首脑的陈布雷拿出一揽子方案供中枢采纳。可是，以陈布雷个人的力量已经无能为力，有“油尽灯枯”之感；在其位，不能谋其职，更使他觉得“负国负公”，他自付担不起蒋介石放在身上的这副重担，同时也对此项职责日渐厌烦。秘书蒋君章追忆陈布雷时，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当时心境：“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作最后呈告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告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有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向以“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在时局危艰的形势下，已不能完成当局给他的命题文章，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之事。而对当局的“失态”，在他政治生涯中却是从未有过的事。“失态”之后，自己也陷于痛苦的自责之中，又没有勇气挣脱蒋介石罩在他心头的脉脉情网。所以在前一天（11月12日）对当局“失态”之后，第二天就服安眠药自杀。

促使陈布雷自杀的远不止令他“饱受刺激”的国事，还有令他在公众面前难以交待的家事。他忠心追随蒋介石，他的子女们却没有受他一贯反共言论的感染，与他同心同德举家随蒋“剿共”，反而与他尽唱反调，毅然加入共产党队伍，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运动。陈布雷共有7个儿子，2个女儿，9个孩子中，女儿陈链早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时，积极上进，后来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战胜利后，陈链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大肆逮捕学生及进步人士，陈链也涉嫌被捕，令蒋介石大为惊怒。尽管“主公”对他体谅有加，只嘱咐他加强管教。对他来说，一家人，两条心，颇为尴尬。陈链的事情还未摆平，小儿子陈过（后改名陈力）又给他惹出事来。两年前，还在北平念书的陈过在“沈崇事件”中参加了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打伤，从此，他的“左倾”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凭着一股正义感和满腔的热情参加学潮的情景，陈布雷对儿子的举动多了几分理解；一贯主张对学潮疏导而不宜武力弹压的他，对“青年军”以武力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心持异议，认为这等于又把无数青年推到共产党一边。子女们的进步与自己“进退无措”使他内心极度矛盾，隐痛时时出现，这对曾经以全副精力协助蒋介石“戡乱”的陈布雷来说，既是一次触动，也是一种煎熬，他渐渐搞清楚他的儿女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思想偏差。由此感到有必要对国民党政策检讨。就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几欲吐血时，陈布雷就觉得此仗不能再打下去，“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因此坚定了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谈判的念头，认为这样，“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可是，打红眼的蒋介石虽然看到眼前的不利战局，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彻底输掉老本，反劝陈布雷“不必如此悲观”，并在11月8日的中央党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并声明一切谣言不会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蒋介石的讲话并非针对陈布雷而发，但“画外音”

中，身处要津的陈布雷自然脱不了干系。陈布雷“好心无好报”，对已被家事国事搅得焦头烂额的他说来，无疑是雪上加霜。“像陈布雷这样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本身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重的知识分子，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他的最后命运。”

最近有学者根据陈布雷公子陈过先生珍藏的其父日记，发现在陈布雷 11 月 12 日写的绝笔《杂记》在发表时，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照这些被删的文字推断，陈布雷所以自杀，是因为共事的党国要人们，在党国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互寻善后之策；而陈布雷自己又无能力，挽狂澜于既倒，致使刺激过度，心理变态，突发忧郁狂，决定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他的同事们则在羞愧之余，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昧着良心抹去这些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名义，造成 50 年来未能破解的人生之迷。陈记述听了同事们议论后的心情是这样说的：“闻朋友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答之曰：‘我惟有一死而已。’”正是朋友们互相询问的这句话促使了陈布雷的自杀。其实，说国民党党国要人出于羞愧和怕影响士气的考虑，而删去陈布雷的杂记内容，颇为确切；说朋友的一句询问是造成陈布雷自杀的直接诱因也勉强说得通，但说成是全部原因，依据略嫌不够。

笔者认为，陈布雷的死是 1948 年以来，国事、家事、身体、心理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所致。对于陈布雷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尴尬的处境，在他死后一个星期，《观察》杂志特约记者就及时作出了评析：“据闻近半年来，陈氏感受的刺激特多，他的女儿陈琏被牵连在北平那一桩军事间谍案子里，被逮下狱，因而影响了他在伦理上的情绪和‘孝忠’的信心，说来是近乎事实的。近因大概是他到处听到民间因限价和金券等等激起了普遍的抢米等种种不利于当局的消息，更有关系。和战纷呶无是处，边城弥望亡万里，‘三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触景伤情以致于厌世，也是有的。他死的半月前，外界就有一种传说，他半月以来提笔竟不能写一字半句，试思，以‘畏垒笔椽’、‘立马万言、一挥而就’闻于国民党之陈布雷，何以不能承命起草重要文告呢？这也是桩很有意味的事……这和传说他十二日之夕，当局命他起草某项文告，他嘱咐仆人回话，说他已睡下了，实则决死之念已定于此时，将各种事体联系起来一寻思，不难想象在陈布雷的脑际，时势已经机陞到如何的田地了。”结合陈布雷自杀前后的家事、国事的发展动向，《观察》记者的分析是全面而符合实际的。

陈布雷感伤时势，前途无望，又无法劝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中枢改弦更张，为了“党国”的前途，放弃一些不利于党国政治民生的措施，只好寄希望于以自己的一死换来蒋介石的“醒悟”，实行“尸谏”。据当时媒体报道，陈布雷在自杀前，曾以三事直言相谏：“停止内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后因谏之不从，决定以死相谏，同时也以此报答蒋介石多年来的“知遇之恩”。无怪乎 11 月 18 日的《中央日报》为陈布雷之死所发的消息中，用上了《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的标题，把他比拟成陈天华第二。所以在临终前，他勇于向子女承认自己“知识暗陋”，“性情孤僻”、“不合时宜”，尽管还自欺欺人地开导子女：“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廿年来

方针上决无错误”，但对子女们只要求他们“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而对他们的投共、“左倾行为”却无半句指责，只希望他们尽忠于“国族”，而没有苛求他们尽忠于“党国”。

陈布雷以书生型的方面吏员，效忠蒋介石二十多年，竟以服安眠药自杀方式结束一生，颇能令人深思。面对国民党的腐败，陈布雷彻底失望，即使“文胆”包天，大笔如椽，也不愿再协助蒋介石，力挽时艰；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难以报答的痛楚，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时刻萦绕脑际，使他难以痛下决心，改换门庭，择木而栖；子女们的人身选择，使他在中枢及“党国”面前丧尽颜面；国民党败局已定，他意识到，继续内战，执行“戡乱”，对国民党来说已无前途可言，必须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讲和，或许还有占据半壁江山的希望。但他所效忠的“主公”拒纳他的建议，他又不愿对蒋“忘恩负义”，只好选择“尸谏”来打动蒋介石，告诉他内战胜利无望，回头才是岸边。国事、家事诸事纷繁，身体、心理极度疲惫，陈布雷实在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也没有人能给他指明一条道路。自寻短见，似乎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可以说，陈布雷之死，是时势所逼，愚忠所驱，他的死，是时代的牺牲品。这一点，他夫人王允默在《悼布雷》一文中说得最为明白：“今大局未靖，君已先自毁灭，赍志以歿，静言思之，谓非时代之牺牲者，亦何可得？”又说：“终因世风不古，同志难求，不敢身尸要职，有负领袖识拔，友好推崇，默默自了，结束一生，惨乎痛哉！”

笔者花如此多的笔墨考察陈布雷之死，并非为了考据而考据，旨在透过这一个案，勾勒蒋介石政府之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严格来说，陈布雷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仍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他自己说的“书生”气质。蒋介石标榜重视文人，但在1948年、1949年的所作所为，却让他身边一批面临角色转换的知识分子失望颓废，感到前途渺茫。陈布雷之死，与其说是自杀，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捆杀；与其说是效忠“党国”，不如说是效忠蒋介石一人；与其说是他个人命运的终极，不如说是国民党彻底走向衰败命运的预兆。他是一代追随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趋向。在蒋介石眼里，陈布雷是难得的忠臣，所以他死后，蒋介石在国人面前几乎把他树立成一个完人：“履道之贞，谋国之忠，持躬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然而，连这样一个“完人”，都不愿再为“党国”效忠，那么，其他声位均不如陈布雷尊崇的御用知识分子，其心态更加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文职大吏戴季陶与陈布雷选择了同一归宿。几个月前，国民党中常委、国史馆馆长、前考试院长戴传贤还在纳闷：“主公”青眼有加、依为心腹的陈布雷，要死，也应该是慷慨悲壮，为“党国”就义，怎会如此消极悲观，撒手人寰。可是，3个月后，他想不通的事终于想通了，并且毅然步了陈布雷后尘。这对1949年国民党政权又形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戴季陶，又名传贤，号天仇，与蒋介石、陈布雷一样，原籍均属浙江，只是他出生地是“天府之国”四川广汉。在其早年生涯里，他就与中国国民党结下了不解之缘。1905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09年回国，任《中外日报》、《天铎报》主编。1911年被通缉，亡命日本，结识孙中山，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紧随孙中山，参加过一

系列革命活动，为孙中山的革命阐释宣传。孙中山逝世后，演变为国民党右派，成为国民党右派中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青年之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惊世宏文，曾经是国共双方注意的焦点，也成了蒋介石日后政治独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些资本，他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此在蒋介石鞍前马后，出谋划策。从 1927 年开始，先后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一度兼任宣传部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训练部长，中央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在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夺取国民政府最高权力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与陈布雷一样，也许追随蒋介石时日既久，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比别人有更深入的了解。1947 年以后，蒋介石及其个别心腹爱将，仍时常夸口要在“××× 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可是戴心里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好愿望。他已亲眼看到，8 年抗战，共产党势力不弱反强，民心不失反得，国民党正好相反。所以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时，亲友家人拥到他的住处，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时，他却一盆凉水泼向来客：何贺之有！今后的困难将千倍艰苦，大家要提高警惕，准备去忍受。

国民党“接收”不久，国统区果然危机四起。目睹国民党诸般病萎不振的气象，戴传贤以其理论家特有的敏感性，感到国民党面临的将是一个大悲剧。可是，最使他忧心如焚的是，在悲剧即将来临之际，许多人神经麻木，清醒的人寥寥无几。他在给儿子（戴安国，留学比利时学习过机电，戴逝世前，任交通部民航局局长）的信中说，“儿今来书言及生活艰难，购物不易，不知老父五十七年间既忧且病，人人以为精神病之故，然非也，世之所谓强健者，或皆为精神病耳。”1947 年 11 月，在写信给侄子时，更是自怨自唉：“余四十年间，于进退出处，十分谨慎，以期不负祖父长兄之教，无愧延次两祖之传，与乎国父十余年之训。”40 多年来，他笃信自己选择的目标，谨慎地为之奋斗，对于多年的从政经历，他自觉无愧于祖父长兄，无愧于国父。然而，眼下这种局面与他心目中的“主义”显然格格不入，所依靠的政府及领袖又不能帮助他完成既定的理想，既恨铁不成钢，又叹无力回天，前途灰暗，忧心忡忡。1949 年以来，国民党四面楚歌，从现政府身上他已看不到一线希望，尚存的一点知识分子的“文化殉道”精神，促使他不愿在与现政府绑在一起，坐以待毙。1 月，淮海战场国民党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南逃广州，其时有人就劝他离穗赴台，被他拒绝。毕竟年届花甲，思乡之情在心头萦绕不断。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在桑梓四川找到归宿。可是，天公不作美，就在临登机之日，连遭大雨。戴季陶似乎预感到这是老天在与他作对，天命难违，终于在 2 月 11 日晚，与夫人一同服下安眠药，他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在广州国民党省政府招待所东山公园结束了反共的一生，其夫人则被送往医院救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 12 日晨离穗赴沪前，于戴氏弥留之际，到床前探视，流连良久，怅然诀别，于右任更是老泪纵横，内心无限悲痛。他在临终前数日，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讲的“我已经是油尽灯枯”一番话，几乎与陈布雷日记所记如出一口。

这并非巧合，而是知识分子兼文职高官的共同心声。他们的死，使蒋介石如失左右臂，如此的“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老手竟弃他而去，令他悲痛难禁，遭逢接连不断的“故人零落”，唯有“中夜唏嘘”，慨叹末日的来临。兔死狐悲，在他死

后，国民政府满足了他魂归故里的夙愿，国民政府3月31日以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国史馆馆长、前考试院长戴传贤，才识恢宏，勋猷懋著，业经命令褒扬在案，兹据行政院呈请国葬到府，追念忠勤，自应特准施行。”4月3日，将戴传贤安葬在成都外西戴氏祖茔。四川各界1日举行追悼会，2日为各界公祭，总算享尽哀荣。

胡适寻找“自由”

毛泽东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曾经说过：“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不过，1949年，这些知识分子已不完全为蒋介石政府所控制，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其说是国民党政府在控制他们，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控制自己。胡适就是其中的典型。

胡适被毛泽东列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所能“控制”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人。可是，1949年前后的胡适，却仍未放弃书生本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依然注重学术。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中，他又不可能置身方外。只是这位桃李满天下、在中国培养出几代学术大师的宗师，已走到政治生涯的末路，在国共决战已见分晓的时候，需要重新做出人生选择。

对于共产党而言，他算是“反共老手”，在共产党所列的40名战犯中，胡适“榜上有名”。事实上，胡适并不总是表现为政治上“反动”这一形象，他的学生中，“左倾分子”不在少数，如吴晗、千家驹等，但他历来注意将学术与政见分开。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他一生的政治信仰，学术研究是他视之如命的嗜好。谁要是违背了这两点，他都要提出批评。他对人类社会实现民主信心十足，把近30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权专制的潮流看成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潮流，认为：“中国人在今天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势，必须选定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族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他理解的自由包括尊重自由、拥护民主、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政治改革四层意思，认为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就应当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专制政治”。正因为他存有自由民主的信仰，他才不懈为之努力。可是，他所依赖的蒋介石政府偏偏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方面做得极差，不断使他失望；共产党与苏俄一脉相承的阶级斗争方法又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对自由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在这两难的境界下，胡适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并没有盲目一边倒。

1949年前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泰斗，胡适的心情较以往更为复杂，他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早为人知的事实，谁都无法加以否认。但他也不是一个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人。他没有政治野心，他一生都未加入国民党。虽然1948年3月，他参加了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行宪国大”，有人认为这表明胡适有政治野心。其实，这是胡适不懂政治权术的标志，他被政坛老手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或者说他为了答谢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不好驳蒋介石的

面子而临时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后，他为没有当上总统感到心情轻松。

1948 年 11 月，东北已经解放，华北战事正酣，北平共产党大军已兵临城下，南京国民政府翁文灏内阁难以支撑。蒋介石又想到了胡适，特地派陶希圣赴北平力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长，胡适以“没有力量接收这个使命”为由婉拒了。在纪念北大 50 周年前夕，他亲口对别人说过：“我不懂政治，不要听外面瞎说。”1949 年 2 月，胡适即将赴美前，李宗仁及行政院长何应钦拟请他取代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他又以不愿改变自由的初衷而谢绝。用他的话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好，哪里还能搞政治。”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懂政治”。在他心中，始终竖立着一根民主自由的标杆。

他反对暴力，但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赞成的；他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对激进的学生爱护有加。对因反对蒋介石专制政府举行游行示威而被捕的学生，总是设法营救，有一次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使学生获得自由。他对共产党倡导的政治路线持反对意见，但对共产党本身并不仇恨。1948 年 12 月 13 日，人民解放军已对北平形成一个包围圈，一天，有一个人走进校长室，告诉他，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是微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几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决定逃跑。对共产党也未深恶痛绝，否则他听了这条消息后，必会暴跳如雷，将共产党大骂一通，以表明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他对学校及学生十分依恋，12 月 14 日他突然接到教育部部长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催促他离平南下，并通知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内战，怎好丢下北大不管。后在南京方面及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的再三敦促下，才于 12 月 16 日，与陈寅恪夫妇同机飞抵南京。对于离开北大，胡适伤心不已。到宁第二天，就是北大校庆纪念日，下午，他应邀出席在宁的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 50 周年校庆大会”上，述及离开北大六千余教员及学生来京时，把自己比作一个“弃职的逃兵”，连称“无面目见大家”，在述及他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时，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会场气氛凄凉异常。会后，善以小恩小惠笼络知识分子的蒋介石为他准备了家宴，替他祝寿，多少抚慰了他抑郁的心情。

不过，他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继续充当蒋介石专制政治的马前卒。1949 年 3 月下旬，他最终决定去美国。临行前，蒋介石有意请他到溪口一叙，被他谢绝。14 年前，抗战初起，胡适毅然挑起驻美大使的重任，在国际舞台上尽展身手，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一向依赖的国民党政府气息奄奄，他再次赴美，已无往日的风光，只见“人还在，山河已改了”。4 月 6 日，胡适赴美，开始近 10 年的寓居美国的生活。但国民党政府始终舍不得放弃胡适这块声望颇高的“社会贤达”招牌。1949 年 6 月，难产的阎锡山“战时内阁”终于组成，阁员名单中居然将胡适列为外交部长，而这时胡适远在美国，并没有得到他的事先同意，胡也无此意向，要胡出仕，已成了阎锡山内阁的“单相思”。这以后的 9 年中，他竟没有回台一次，足见他对国民党官场心灰意

懒。但他对祖国的眷念之情从未改变。美方曾有人愿以优厚的条件为他在美国永久定居提供方便，他不予接收。他不想加入美国国籍。对于台湾方面，他多次发表意见，建议、批评多于吹捧赞扬。晚年有病在身，仍未忘记祖国，眷念大陆。1958年抱病回到祖国的台湾，专心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对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推崇有加，说：“共产党中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1955年正当大陆批胡适思想如火如荼时，胡适还说，他在这30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

1949年前后，胡适力图避开政治是非，继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信仰，但在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不是能令他倾心皈依的政治派别或实体，于是选择赴美，表示在美国将多学习，研究世界大势，此外拟多发表演说。对于胡适的选择，我们今天不能单纯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角度作简单评判，而要用立体的视角客观分析。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的那样：“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想下水，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胡适之所以没有回到大陆，也许可以从他1949年1月对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说的一段话中寻到一丝原委。他认为，对国民党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依旧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这类话在这以前的自由主义人士口中就已不断出现过。1947年储安平在时评《中国的政局》中曾说过，“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们把沉默的自由放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为这一理想尽力奋斗，尽管这种追求在政治观念上存有偏差，在其有生之年，也很可能不能实现，但避开政治倾向不谈，在他们身上，至少体现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韧”的追求精神。从胡适的抉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1949年，也并不是都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一味追随，对共产党也不是一贯地仇恨。胡适的“出走”说明，1948年以后，国民党已无法得到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典型个体的全力支持。

翁文灏宦海回头

翁文灏是1948年“八·一九”币改的主要策划人，翁虽然就任行政院长，实是书生型的官员，所以笔者仍把他列为知识分子一类加以考察。从翁接任行政院长、出面组阁起，政府就露出失败征兆。蒋介石1948年5月20日宣布就任“总统”，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本属意张群、何应钦，张、何政治圆滑，审时度势，坚辞不就，才邀翁出任。按常例，在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行政院就应当组成内阁，翁文灏组阁却用了一星期。根据媒体的分析和预测，在当时的形势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长，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谁倒霉，谁来做谁就牺牲。除非行政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

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除非有谁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可是作为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只是一个账房先生，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没有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假如他失败，不一定是他个人的失败。果然，在他主持币改失败后，翁就向“总统”提出辞职。

蒋介石与翁的亲密关系非止一日。早在 1932 年，蒋介石在庐山就亲聆过翁文灏的讲演，1934 年，翁在浙江武康遇上严重车祸时，又是蒋介石出面组织抢救，把翁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蒋不耻下问的“知遇之恩”和解人围困的“救命之恩”，都使翁很难拉下脸来，拒绝这位浙江老乡的厚爱。币改失败后，翁文灏力辞行政院院长之职，经蒋介石挽留，继续留任。翁上台之初，并不是有勇气接收内阁大任，而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组阁大命，“既无勇气拒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拖至 1948 年 11 月，才得以卸任。结果改革之后，怨声举国，十足当了一回国人的“出气筒”。受命于危难的行政院院长一职，没有使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反而变成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笔者这里并不想过多着墨于翁文灏的政绩优劣，而是要分析为什么这样一位与蒋介石私人感情密切、又被共产党列为首批战犯的知识分子型的国民党高官，1949 年没有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日后还选择了返回祖国大陆，由国民党高官转变为共产党新政权中一分子，而且在当时情势下其政治生命还是不可预知的。

1949 年，翁 61 岁，他的选择应该说不会是轻率的，不过他当时的心情却很复杂。起初他也想过定居台湾。1948 年 11 月，他在行政院院长岗位上离任，12 月，他把老父、老妻、大儿媳和孙女等家眷送往台湾，让儿子心源、心均留在上海，一人独居南京，观望去路，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一家人分居三处，并非他的初衷，更多的是因为他是否跟蒋介石走。他也想过留在大陆，可是共产党开列的战犯名单上，他的名字赫然在上。所以当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最后一任委员长、曾经是他部属的孙越崎等建议他将来最好不要走时，他指着桌上摆的战犯名单说：“你们可以不走，我是没有办法不走的。”言下之意，走，实出于无奈。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翁去台湾，将儿媳、孙女打发回沪，自己 5 月 21 日从台湾来香港。他的不少部下和同事都劝他：他的儿子、儿媳、孙女都在内地，他和老父、老妻三个老人流落在外，太寂寞凄凉了，最好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内地，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要他好好考虑。翁自己不是不想回内地，而是认为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表示除非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写过一份“悔过书”，表示返回祖国内地的愿望。在没有得到共产党正式意见前，他拒绝台湾方面的邀请，为免遭暗杀，于 1949 年 11 月飞往巴黎。共产党方面对翁的态度灵活而富有诚意。周恩来收到“悔过书”后，当即表示愿意做民主人士方面的工作，至于战犯问题，周的解释更具艺术性，说：这是新华社消息，不是党和政府正式宣布的，可放心。共产党的态度打消了翁最后的疑虑，1951 年 1 月辗转回到祖国怀抱。

比起其他一些国民党高官，他的政治态度相对要开明得多。尽管他事实上是在为蒋

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工作，内心却想超然于政党之外，这是他不参加国民党中各种派系的原因。对共产党也不愿过多责骂、打击。但是等到做了行政院院长后，“超然”是不可能了，公开场合，对共产党的谴责并不少，这在他内心是“冲突”的，只能凭自己的尚未泯灭的一点良知来应付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如拒绝由行政院发令，逮捕进步学生等。1949年上半年，台湾发表的许多人签署的《反共宣言》，他的名字也列在里面，但事先并未征得他的同意。翁文灏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身居国民党高位，却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开始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工业救国”迷。他们想救国报国，就得依附于一个政府。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良知和独立精神；作为一个官员，他们身在宦海不得自主。经历了政治失败，对所依附政府失去希望，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的渴望再度浮现于心头，不甘再作腐败政治的附庸，这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暗投明，或至少抱着与原政府不合作态度。翁文灏这种被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在1949年前后作出如此人生选择，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又一重要标志。

以上是国民党政府中，智囊型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选择。无论陈布雷、戴传贤，还是胡适、翁文灏，他们的归宿不尽相同，他们的心态却大同小异，共通之处就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蒋介石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都是以“一介书生”入主“朝政”，都想以自己的毕生精力来报答他们的“主公”，把政府改造成一个“好政府”。他们没有想到，在权力专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的出仕，给专制政治撒上了一层“民主”、“开明”的金粉，更加掩盖了专制政治的本来面目，使一些本来要向当局争人权的、争民主的人士尤其是知识界人对政府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在政府无可救药之际，他们选择的归宿又有一定的差异。陈布雷、戴传贤是一类，他们对蒋介石死心塌地追随，一心要为蒋介石的统治体系树立他们理想中的“道统”，希望在蒋介石身上实现“君统”和“道统”的统一。正如王芸生刻画的那样：“戴季陶这家伙，简直是一代妖狐。他的私行极坏，在私生活方面与蒋关系极深。……他写了一本《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曲解三民主义，硬与中国封建‘道统’拉关系，说什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文武周公孔子又以是传之孙中山’。……他这一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根据。”“陈布雷虽谈不上什么思想，但他的旧书生的气息极为浓厚，与蒋遇合，俨若圣君贤相……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而蒋开口闭口不离‘道德’，每篇文告都要以‘道德’责叱人民；高唱所谓新生活运动，标榜四维八德；案头读物摆上《宋元学案》。这些，都是陈布雷给他的影响。”可是，当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君统”步调与“道统”轨道分叉扬镳时，他们在“君统”与“道统”之间，选择了为“道统”殉道。这样，在“殉道”的同时，也保留了一点传统士大夫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更确切地说是傻气。

相对于前者，翁文灏身上，具有更为独立的人格，同样是为了报国，但他能将未来的国家与他依赖的政权区别开来，选择了光明的前途，投奔到和平的阵营，放弃了“君统”，皈依了新的“道统”，即新民主主义，并愿意为之奋斗。胡适超脱出“君统”和“道统”的樊篱，在两者之间，重新选择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学术研究。即使

后来他回到台湾，也没有再投身于官场宦海，而是抱定“技术救国”的宗旨。他晚年的处境比较凄苦，可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却重新焕发出光彩。他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西方理论整理国故等一系列治学方法，仍是今天许多学者、学子奉行不二的原则。

这个群体与纯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完全一样，其骨子里还保存了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希望现政府奋发有为，只是“阿斗”难扶，眼看着大厦将倾，油灯欲灭，却无力拯之于垂危。大难将至，各奔东西，就是不愿与国民党政府共存亡，在最后时刻，显示出仅存的一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意志和品质。他们的抉择，对大多在国民党政府或学术机构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去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坚定了他们留在大陆的决心。如国民党在溃退前，曾想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遭到大多数院士及工作人员的反对。尽管国民党政府从 1948 年 1 月开始，就在为搬迁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他们对当年西迁之苦记忆犹新，闻听先期迁台的同仁处境并不乐观，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腐败和人心的向背趋势，决定留在大陆，等待解放。

第二节 去意徘徊

蒋介石军队溃败前夕，蒋介石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被困在战区前沿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共产党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留在计划建立的新政权下。去或留，知识分子大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1948 年底北平被围时，国民党政府把计划南撤的北平文教界人士分为四类，分批抢救：第一，各校、院、会负责首长；第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三，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第四，学术界有贡献者。总计为数不过三四百人。并任命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台湾大学校长，以台大为基地，以便安排内地迁往台湾的研究所和由内地迁往台湾的学者，为大陆来台学者作准备。1949 年 1 月 9 日，傅斯年飞抵台北。他发表讲话说，和平固举国渴望，但在目前情势下，恐怕难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因共党宗旨“纯在征服”，奢言和平，不过准备投降而已；对于台大，他说，以开诚信，布公道，求安定，求进步为方针，并将在互助基础上，与外界学术研究机构合作，最短期内充实文理两学院，使达到全国最高标准。在后来的一个月中，这三四百人的名单是否全部列出，笔者一时无法确知，但“抢救”著名学人的行动的确紧张地进行过。

北平解放前，国民党官员纷纷逃跑，北平一片混乱，国民党教育部急电各大专院校南迁，遭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抵制。国民党政府又派出飞机北来接人。知识界第一批坐飞机南迁的是胡适、陈寅恪等，从南苑机场起飞。随后教育部派两批飞机来接学者、名流南迁，第一批因南苑机场遭解放军炮火封锁，飞机无法降落，折返回京。国民党在东单临时抢修机场，供第二批飞机降落。坐这批飞机走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

大学校长袁敦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北平艺专音乐系主任赵梅伯等人。有人名单被列入抢运之列，但他们不愿离平。如汤用彤、徐悲鸿等就属抢运对象，汤用彤宁愿把登飞机的名额让给刚才还在溜冰、穿着冰鞋的亲属，而与子女一起呆在北平，等待解放。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徐悲鸿、吴作人等人的商定下，他们本人不离开北平，艺专也不南迁。国民党政府甚至派人前来劝说，并制造许多谣言。威胁不成，又进行利诱，答应解决他去印度办展览的经费，徐悲鸿仍不为所动。

1949年在抢运知识分子行动中，国民党无疑是大输家。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抢运结果就是最好的说明。据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整个建制迁台的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单位，其余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和社会学所全部留在祖国大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迁台的总办事处30人，历语所50人，计80人，占总人数的15.8%。194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召开时，选出的院士共81名，1949年去台湾的9人，占总人数的11.1%；去美谋职的12人，占总人数的14.8%；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总人数的74%。其中原中研院人文组的众多院士中，除胡适、傅斯年、董作宾、赵元任等十人赴台、赴美或滞美外，其余均留在大陆。中研院院士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他们在社会剧烈嬗变的时刻，相信自己的抉择，反映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

共产党则既是政治、军事上的胜利者，也是文化上的大赢家。抗战以来，它留给国人的印象是务实和爱民。1948年底到1949年，这种形象在国人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共产党就是进步的象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批人把爱国与爱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及其政府画上了等号，爱国即爱党，爱党即爱民。许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完全基于政治理由。他们不喜欢国民党现政权继续下去，所以，他们即使有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危困的办法，但也不愿意献出来，他们知道，凡是帮助现政府解决困难，就是帮助巩固现政权。他们宁愿在经济紊乱之中等待光明的来临。他们从现政权无可救药、一定要颠覆这个前提出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在短短痛苦过程中，当然有一部分人要牺牲，但是在长的痛苦过程中，被牺牲的人更多。好比女人生育之痛苦，创造新生命、新时代，这点痛苦是必须付出的。宁可让痛苦程度强烈一些，可是不能让痛苦时间加长，因为时间一拖长，母体怕受不住，等到光明的新时代来临时，享受这新时代的人，却已失去了享受的能力。他们对于有希望把中国治好的党派或政权，真心向往。

“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好，我都拥护。”这是冯友兰先生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新中国成立前夕或成立不久，不少知识分子出于对光明前途的追求，纷纷在国共政权之间、中外之间，毅然选择了共产党，选择留在祖国大陆。还有一些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回国，投奔到共产党政权下，拥护共产党及其即将建立或已经建立的新政权。他们不是政治的投机者，而是共产党的追求者。为了实现这一信仰，他们愿意放弃身外的一切。他们当时的心境澄明，态度坚决，一心向往新生中共政权。1947年，眼看全国就要解放，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在美国长期住下去。冯说，他绝不步“白俄”的后尘，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他越是要赶回去，“怕

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回国后，对于“走不走”的问题，冯的态度很明确，抱定了社会主义“尚贤”的信念，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就这样，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并在以后维持清华的治安、等待共产党接管、保持学校的安定中起了很大作用。多少年后，冯还这样表达过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无比崇敬心情，认为：“毛主席的功劳无论用什么字眼形容都不过分。”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推论：只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中国人不但能够站起来，而且还能向前走得更远。“这不仅是某个人的心情，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情。”1949年，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还在美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虽然痛惜国民党的失败，但又希望即将奠定胜局的共产党能容纳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他在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恐怕已经是无问题的了。如果使各党派合作，是今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解决的办法只有：自由主义者应当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党承认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权。这一点是相互的，自由主义愈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就愈能承认自由主义的自由。反之，共产党愈能承认自由主义的自由权，自由主义者就愈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何兹全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面对国民党人时，理直气壮，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好像他就是共产党的代表；面对共产党人，又觉得自己是个不争气的国民党人，好像是个罪人。他虽与共产党人无仇，但毕竟是“几十年的国民党人”。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有3条路可走：留在国外、去台湾、回大陆。但最终选择了回大陆，1950年9月成行。他在回忆中说：“共产党的统治对我有鼓舞有疑惧，决定我回国的力量是‘爱国’，是‘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个游子召唤回来。”他们的爱国思想在回大陆后，很快与爱党融为一体，并由爱党转变为崇拜党，还能够适应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这就是所谓“只有牺牲脑袋里的个人民主，真诚彻底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祖国”。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他们为自己具有这种“投降”思想庆幸，因为它挽救了他们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在历次运动中，一批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下去，他们却平安无事地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多了个投降思想，尊重共产党领导”。倒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因为“骨子里多了一根‘反骨’——资产阶级民主，两党制”。后来共产党掀起的各种运动，与1949年前后，共产党战略主张和政治魄力有一定的区别；何先生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如何没有“倒下去”，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在1949年向共产党的“投降”与在历次运动中的“投降”和“尊重”出发点也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1949年前后，他向共产党“投降”是诚心归附，是对光明前途的确信，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心声。

1949年前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一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感到温暖，他们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1949年，在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受到应有的关照和礼遇。如有“将军诗人”之称的陈毅，可以说既执行了共产政策，有些方面还比中央文件所规定的走得还远。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对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又暗示要掌握一定的“度”，陈毅则似乎对这个“度”不太在意。在南京时，就曾亲自到中央研究院拜

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熊子容等专家，陈毅以渊博的知识、趣雅的谈吐赢得了专家们的好感。在接管上海过程中，他曾不止一次指示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夏衍等人，做知识分子工作，“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接管工作基本分为“接、管、清、改”4个字，陈毅则强调，在文化界，“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敢讲，放在心里。上海的文化工作基本按照这些指示去做的，尽管这些做法日后不止一次挨过批评，说“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吹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等等，事实证明这些方针是正确的，效果也是好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49年6月5日下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126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陈毅的一番开诚布公、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知识分子的好感，据说听了这次讲话，上海文化界形成了“陈毅迷”，不少人讲出了自己不为人知的故事（如吴有训讲了国民党多次要把他送台被他拒绝），有的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

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通过与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次接触，亲身感受到他们全新的工作作风，对新时代赞不绝口。1949年，以82岁的高龄迎接解放的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在参加过第一届政协、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交换过意见、登临天安门城楼目睹开国大典后，回想起祖国及自身大半个世纪的坎坷经历，感慨万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他曾亲口对儿子张树年说：“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今天有希望了。”历史学家陈垣谈他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时说：中国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共产党政府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从前所没有的，的确是历史上最省钱、最廉洁的政府。他通过解放后的北平街上，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等，判定新政府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1949年7月1日傍晚，北平群众在先农坛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28周年。毛泽东到达会场时，群情沸腾，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人民的领袖，连长久不写诗的俞平伯也写了充满激情的白话长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那时，有些参加集会的知识分子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俞平伯更是没想到在仅仅四五年后，要用同一枝笔来写检讨。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人民的领袖是竭诚欢迎拥护的。

知识分子还积极加入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去。1949年9月10日，华北高教委召集平津各大学教授，研究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学方法，规定了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材，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有关著作作为阅读教材。通过由艾思奇、费孝通、张岱年、侯外庐、常任侠、梁寒冰等组成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直属高教会，领导辅助各校进行该门必修课的教学，各校另成立分会，领导具体教学。从此，马列主义作为一门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中生根下根来。